

#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

桑 兵

**内容提要** 中国近代学术界的学分南北,在后来主流的叙述中,隐然成为新旧的同义词,并有连续的人脉关系,化作成见与心结,继续操控学界的动向。实则南北各有新旧,一般学人也不作此是彼非,壁垒森严的划线。出身北京大学而非新文化派的金毓黻,凭借1920年代下半期尤其是迁都以来的南北学界对流之风,入主南派大本营的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因应国内外学风转移,以及个人阅历学识的增长,其观念与人事均主张融会贯通,捐弃各执一偏的极端,回归学术的大道本原。

**关键词** 金毓黻 南派 北派 学风 近代学术

中国历史上的学分南北,由来已久,仔细考究,所据大都是后来的臆见,而非当日的实情。五四新文化以来,南北学人的派分因缘大学、刊物、学会等等现代元素的联结作用,观念差异与人脉亲疏相互纠葛,明争暗斗,成为无形之手,操控着学界的取向,影响学风的流变。双方代表人物表面似乎并非强分疆界,畛域自囿,实际上成见不浅,心结已深。影响之深远,至今流风遗韵不绝。不过,民国时期的所谓学分南北,依据不同,讲法各异,深究起来,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绝非楚河汉界,壁垒分明。尤其是国民政府迁都之后,学术文化中心逐渐转移,双方各自利用手中的权利资源,彼此渗透。另一方面,双方代表者在争斗过程中难免意气用事,偏离主题,其执着纠缠的此是彼非,在旁观及后来者眼中未免偏激,因而修正调整,回归学术本原。出身北京大学,抗战期间又在中央大学史学系扮演要角的金毓黻,关于南北学风异同的看法及其与南北两派学人的关系,并非中西新旧,非此即彼的观念所能解释,在一般近代学分南北的叙述中或为异数,只是换一角度看,这样的异数反而显出某种常态,值得后来者深思反省。

## 一、北将入主南营

1940年12月,迁徙重庆的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的历史学会编辑出版不定期刊物《史学述林》,1941年元旦,担任中央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的金毓黻为该刊题辞,特别从南北派分的角度立论,全文如下:

“本校之历史学系,具有二十余年之历史。盖自南京高师之史地科,东南大学之史地系,逐渐演

变而成,且继长增高,以至于今日,甚矣其难也。尝谓吾国古今之学术,因长江大河之横贯,显然有南北两派之差别。先秦诸子,孔、孟居北,而老、庄居南,儒、道二家,于以分途。魏、晋、南北朝之世,经学传授亦有南北两派,颇呈瑰玮璀璨之光。至唐初《五经正义》成书,而其焰以息。清代学者初有汉、宋二派,继则经学家有古文、今文之分,宋学及古文学多属北派,而汉学及今文学多属南派,皆有显然之途轨可寻。史学亦然,廿载以往,北都学者主以俗语易雅言,且以为治学之邮,风靡云涌,全国景从。而南都群彦则主除屏俗语,不捐雅言,著论阐明,比于诤友,于是有《学衡》杂志之刊行。考是时与其役者,多为本校史学科系之诸师,吾无以名之,谓为史学之南派,以与北派之史学桴鼓相闻,亦可谓极一时之盛矣。今校长罗君治西史有声,曾为北派学者之健将,嗣则来长吾校,将满十年。向日以为分道扬镳不可合为一轨者,今则共聚一堂,以收风雨商量之雅。盖学术以互竞而猛晋,譬之江河分流,以俱注于海,其趋不同,而其归一也。违难以来,迁渝续课,本系爰有历史学会之组织,并因时与地之便利,从事巴蜀史迹之考察,甲骨文字之整理,同学诸子,交相勗勉,欲以研治所得,分期刊行,就正当世,而本系诸师,亦稍出所作,冠之篇端,以当皇引。编次既竟,命曰《史学述林》。夫学问之道,以求是为归,何必尽同。本系诸君应勿忘往日史学南派之历史,以共树卓然自立确乎不拔之学风,因而相激相荡,与以有成。是则本刊之行,不过其嚆矢焉耳。”

这篇文章简短而概括,涵盖了学术南北派分的历史,指出了近代南北学派分合的过程,甚至希望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的学生发扬南派史学的学风。其中的深意发人玄想,尤其是这些话出自一位非但不是南派旧人,而且是北派同门的学人之口。

金毓黻 1913 年入北京大学文学门,1916 年夏毕业。此时北京大学的新文化派尚未成形,金毓黻无与其间。不过,所谓北都学者,主要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金毓黻与之毕竟有同校之谊,这一因素对于金毓黻进入中央大学乃至其后来的学术活动,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因为对待包括文言与白话在内的整个新知与旧识态度的差异,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与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双方在公私明暗的各种场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论争。在不断的冲突摩擦中,彼此成见益深,心结加重,无事之时,还能维系矜持状,一旦涉及人事权利,则此疆彼界,爱憎分明,毫不含糊。

1928 年之前,北京大学位处京师,挟最高学府之势,带引领风气之威,气势无疑压倒南派。1928 年 2 月,吴宓与来访的陈铨“因谈及中国近今新派学者,不特获盛名,且享巨金。如周树人《呐喊》一书,稿费得万元以上。而张资平、郁达夫等,亦月致不贲。所作小说,每千字二十余元。而一则刻酷之讥讽,一则以情欲之堕落,为其特点。其著作之害世,实非浅鲜。若宓徒抱苦心,自捐贲以印《学衡》,每期费百金。而《大公报》在我已甚努力,所得报酬亦只如此。呜呼!为义为利,取舍报施,乃如斯分判。哀哉!”“学衡派”内部,对于《学衡》的看法则出现分歧,胡先骕认为:“《学衡》缺点太多,且成为抱残守缺,为新式讲国学者所不喜。业已玷污,无可补救。”主张改到南京出版,由柳诒徵、汤用彤、王易三人主编,而且“须先将现有之《学衡》停办,完全另行改组。丝毫不用《学衡》旧名义,前后渺不相涉,以期焕然一新。而免新者为旧者所带坏。”令吴宓大为悲愤。和学衡派健将吴宓关系密切的陈寅恪,也曾劝吴宓放弃《学衡》,因为已经没有社会影响。而吴宓拟作“宣传作战之地”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学衡》同志莫肯相助,浦江清、赵万里等又主张加入语体文及新文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 1993 年版,第 4629—4630 页。题辞系于 1940 年 12 月 30 日,但据 1941 年 1 月 1 日的日记:“撰《史学述林》题辞。”则实际撰写的时间应在 1941 年元旦。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 4 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7 页。

《吴宓日记》第 3 册,第 437 页。

学,并请朱自清为社员,吴宓只好放弃一切主张、计划、体裁、标准,遵从诸君之意。

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之后,尤其是迁都南京,引起南北两派的态势及关系的调整变化,情形远较先前复杂。国民政府南迁,需要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巩固统一的局面,与政治、军事的行动相配合,在思想文化方面,力图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破旧立新为主导的趋向,回归守成。为此,特调在中山大学任上整饬校风有功的朱家骅接长中央大学。朱家骅一生,先后在北京、中山、中央三所大学任教长校,这三所大学不仅地域上分别位居中国北、南、中部的重要位置,更具有社会旗帜性的广泛影响力。1944年2月25日,朱家骅在中央大学纪念周讲话时说:“中央大学在学术贡献上和学生在社会成就上,都应该领导他人,起一种示范作用。中央大学不仅具有一般大学与大学生的使命,还应负起特殊的责任。”而这样的领导地位和示范作用,原来无疑是由北京大学来承担。只是中心地位的转移,不仅仅是空间位置的移动,更伴随着风气的改变。

迁都造成的政治中心南移,不可避免地影响故都学术文化的中心地位,加上国民政府有意扶植中央大学取得领导地位,本来作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自然首当其冲。连高阁仙都注意到,“前者文化中心在北平,今已渐有转移之势”。并且提出:“东北虽不必为文化中心,而由学者努力之结果,亦可有构成文化中心之希望。”作为文化中心,北平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变动,广东等地也萌生跻身学术文化中心的意愿。迁都引起北平文化中心地位的动摇,无疑给其他地方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乘机提升自己的学术文化地位。

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北方学人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一方面试图将政治与学术分离,努力维系故都的学术文化中心地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后来一再强调,北平时期的北京大学从一度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的漩涡,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另一方面,北方的新派学人对国民政府先倨后恭,在抵制大学区、反对党化教育和批评训政等一系列冲突之后,南京的国民政府和北平的新派学人开始尝试调整改善双方关系,政府方面吸收新派学人参政,新派学人方面则予以积极响应。相比之下,反而是与新派不和的学人更能保持自由独立精神。

五四时期国民党曾经受到思想宣传和青年运动的影响,有意识有目的地吸收参与五四新文化的青年加入国民党,而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也能从富有朝气的革命的国民党那里感受到强大的磁力,加上蔡元培等人与国民党的渊源,早有一些北京大学出身的师生陆续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与知识界的重要纽带。先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罗家伦、顾孟馀等,都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及念书。金毓黻指罗家伦为北派学者的健将,其实后者治学的时期并不在北大。经过国民政府吸收学人参政,北京大学出身的学人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的权力位置,成为新政权炙手可热的新宠新贵,适应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政治中心的转移,他们开始想方设法在新的中心建立人脉,或是因缘校友的关系,给予同门种种的方便和照顾。

金毓黻显然也是受惠者,出身北京大学而能在南派的大本营中央大学立足并且担任要职,他的那些占据要津的同门师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毓黻进入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傅斯年是关键。金毓黻在1938年5月1日的日记中记到:“昨晤傅孟真于曾家岩中央研究院办事处,余之来中央大学,系由君介绍,厚意可感,不敢忘也。”不仅如此,抗战胜利后有流言不利于金,傅斯年闻知,不

《吴宓日记》第4册,第196页。1929年1月19日,吴宓与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等会议《大公报·文学副刊》改良之事。

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静晤室日记》,第2503页。

蒋梦麟:《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184页。

《静晤室日记》,第4144页。

避嫌疑,力证其清白。此事令金毓黻万分感激,在日记中记到:“二十五年之夏,余自沈阳逃出,经日本而至南京。援我于困厄之中,而不致饥寒于他乡者,傅君孟真也。近八年来,与孟真不常晤面,而精神息息相通。近以外间流言不利于余,日前偶向孟真言之,孟真曰:‘君之行谊,余知之最清,设有人不利于君,余必为之辩护,请勿介意。’余乃为之大感动,古人云‘患难乃见交情’,吾于孟真见之矣。”次日金毓黻将所撰备忘录请傅斯年签证,“君即慨为签证,并系以注语甚详,谓余所记皆属事实,并谓余受困时曾寄语孟真,将乘机逃出,后果践其言。噫,知我者舍孟真其谁属哉!”他还曾经赋诗夸赞傅斯年道:“北方学者谁第一,以吾所知有孟真。宁谓豹文终可隐,由来龙性最难驯。尘飞雷动三千里,雨骤风狂十二春。起废箴言斯责重,君如不负属何人!”

表面看来,傅斯年与中央大学没有关系,其实迁都之后他一直关注学术文化中心位置的流动,以及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早在1933年他就致函丁文江,谈及“北平为中国文化中心”一说,是非且不论,北平之有学术空气,他处无之,乃是实在。今华北局面不可测知,而东南物力所集,如不成一文化中心,即不有学术空气,成何国家?此一责任,中央大学无能为也。洋泾滨尤无能为也,如欲有之,非自研究院启发不可。”尽管他对中央大学评价不高,但毕竟不能无视国民政府极力扶持的态度,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效果。有迹象表明,傅斯年很想将触角伸入中央大学,而且他的确具有一些便利条件。

傅斯年职务上与中央大学并无关联,其介绍能起作用,应与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有关。金毓黻在1940年2月29日《致罗校长志希书》中说:“以愚个人言,承公不次之厚爱,得来本校任课”。而且罗家伦并非一般性地接受私人请托,金毓黻“到校之后,亦常与公接晤,每次晤面,往往披心见素,推诚相与,出愚意想之外。”这种礼遇,在中央大学教职员乃至院长系主任中堪称异数。据金毓黻说:“自愚入本校,前后已三、四年,见公与各教授之联系甚少,从未见到各院办公室或教职员宿舍作少许时间之谈话。与公常见面者,一为各院长,一为各系主任,然非有事亦不常往。每次往见公者,多在外室守候,或至数次不得见。因此之故,无要事之系主任,及无责任之教授,决不肯轻与公面谈,又因此而生之隔阂猜疑亦属不少。”金毓黻认为:“他人如肯尽言于公,公必能尽量接受。以此向他人言,则不甚信,久之愚乃悟公于处人接物之方式,尚有未尽适宜,以致于此极也。”可见罗之待金非同一般。

而金毓黻对罗家伦等也常怀知遇之恩,他说:“罗君志希于余有刮目相看之意,深可感也。尝谓志希有学人风度,此非阿好之语,有目者当共见之。”不仅称罗家伦是北派的健将,而且将其校长中央大学的10年视为南北学人和衷共济的体现。两人关系紧密令金毓黻敢于直言谏事,曾效仿汉贾谊上书罗家伦批评中央大学校务,认为“公之现境诚所谓抱火厝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而已耳。”他指责罗家伦长中央大学不如清华时期有计划,应付环境,迁就事实,重量轻质,“本校各系之名教授甚多,足以动青年之观听者亦不知凡几,然研究学术之精神,终逊于西南联大一筹者,正以各院系无特殊研究学术之表示,亦不见注重何种学术以为本校研究之中心,因此不能引起社会人士之重视,此即重量不重质所受之影响也。”他还希望罗家伦不要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对

《静晤室日记》,第5934页。

《静晤室日记》,第5486页。

1933年6月(9)傅斯年致丁文江,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档案。

《静晤室日记》,第4487—4488页。

《静晤室日记》,第5894页。

于学生参与党派活动,也要裁以正义,大度包容。对此,罗家伦不以为忤。

向罗家伦推重金毓黻的北大同人,不止傅斯年一人,金毓黻称:“往者段君锡朋谓余为东北读书种子,属罗君志希善视之,其厚奖余甚可感,而余则深愧不足当此称也。”

得到提携之余,北大出身者相互之间也就有了某种义务责任。稍后金毓黻受聘于东北大学研究室,因中央大学各方面矛盾逐渐尖锐,系务繁琐,分任两地,难以兼顾,遂致函已经离任的罗家伦,“托向顾新校长将中大史系主任辞去,以便专任东大研究室事。顷接志希来电转顾君之意,坚约回渝。董教务长冠贤亦来电,以是为言,且以余出身北大,顾君亦为北大旧人,不能言去。”1945年12月1日,金毓黻“傍晚于密雨中入城,参北大同学会,与会者百余人,为欢送傅君孟真赴北平也。”其间金毓黻还赋诗一首,“傅君孟真为余北京大学同学,近将北上接收母校,赠以此诗,藉壮行色。短衣匹马西来久,霁月光风北望高。对我眼明如蜀锦,多君语快过并刀,神京祭酒当时重,太学诸生旧日豪。天际知看沧海去,凭将只手挽滔滔。”

## 二、南北与新旧

金毓黻虽然出身北京大学,却并非新文化派阵营中人。他从北京大学毕业之时,蔡元培尚未接长北大,并对北大进行兼收并蓄的改革,除了太炎门生外,各式各样的新派人物还没有进入北大。而太炎弟子当中,既有后来新文化派的骨干,也不乏被视为保守的代表。金毓黻在北京大学文学门的几年间,先后从陈衍问诗文法三年,从朱希祖受中国文学史二年,听陈汉章所讲《中国通史》课程,尤其受黄侃的影响为大。他曾说:“以现世之人为师,良者既不多得,则莫若以古人为师……吾昔研理学,以陆稼书为师,研文学,以姚、曾两氏为师,皆以古人为师也。至研小学,始以现世之人黄季刚先生为师。然求之今世师,如黄氏者有几人焉?以现世之师难得,故终不能不以古人为师也。”

而黄侃对金毓黻也是另眼相看,称“斯乃东序之秘宝,匪独渤海之骏雄也”。据汪希针转告金毓黻:“黄先生每与相遇必称毓黻,相念至深,又尚论关外人必以余为称首,何其见爱之甚也!”两人的师生之谊非同寻常。1927年11月金毓黻往谒任教于东北大学的黄侃,“相见之下,欢若平生。盖先生颇赏余治学能谨守绳尺,本师说以为学而不为外物所囿。余亦以先生为当代大师,负有专门绝学,而不能与俗谐者也。”而黄侃虽为太炎门生,却和刘师培一道,被认为是蔡元培改革北大以后的保守派代表,与多数同门分道扬镳,并曾和钱玄同当面冲突。

南北学派之分,虽有习惯的指认和叙述的方便,却未免抹杀事实。尤其是南北之中暗含新旧,与实情分别更大。就实际而言,南北学人当中均有所谓新旧之人,而且近代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新旧的界线变动不居,先锋落伍的现象屡见不鲜。五四新文化以后,在黄侃等人看来,关内庠序竞器成风,尤其是新文化派渐居主导的北京大学,新派不断排挤旧派,1920年代后期张星娘函告陈

《静晤室日记》,第4487—4488页。

《静晤室日记》,第4661页。

《静晤室日记》,第4778页。

《静晤室日记》,第5959页。

《静晤室日记》,第3998、5599、4046页。

《静晤室日记》,第279页。

《静晤室日记》,第1963—1965页。黄侃语见当日日记所录黄侃复金毓黻函。

垣：“北大党派意见太深，秉事诸人气量狭小，其文科中绝对不许有异己者。而其所持之新文化主义，不外白话文及男女同校而已。当其主义初创时，如屠敬山等史学专家皆以不赞同白话文而被摈外间，有知其内容者皆深不以其事为然。北大现在已几成为政治运动专门机关，不宜再使与纯萃学术牵混。”在所谓旧派人物纷纷他去之后，原来的新派内部亦起纷争，曾经一度能够把持校务的浙人尤其是章门弟子相继被挤出北大。至于《学衡》一派，根本否认自己守旧，他们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在吴宓看来，钱基博、黄节等才是旧学家。

随着政局和风气的变化，南北学人既有对垒，也有对流。五四运动发生后，蒋梦麟等人主张蔡元培复长北京大学，“同人当竭尽全力办南京大学，有子公在京帮助，事较易。办成后渐将北京新派南移，将北京大学让与旧派，任他们去讲老话（亦是好的），十年二十年后大家比比优劣……总而言之，南方大学必须组织，以为后来之大本营。”黄炎培和沈恩孚分别眉批道：“此亦是一句话，但弟意北方亦要占据，且逆料旧派无组织之能力也。”此时未打败仗，万无退回老巢之理。”其实各派学人的本意，无不想南北通吃。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南方学人北上的会合。在清华大学内部纷争不断之际，吴宓计划在东北集合力量，将各地的“学衡派”人士汇聚到一起。而陆续被北京大学排挤出来的桐城派以及黄侃等人，也相继出关。可惜东北局面不能持久，加上一些人本来对于出关有所顾虑，只好回到关内，不少人仍然选择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一脉相承的中央大学。黄侃、吴梅、朱希祖等人相继加盟中央大学，一时间中央大学似乎成了北京大学弃将的用武之地。金毓黻进入中央大学历史系之时，正是由朱希祖担任该系的系主任。

就人脉与学问渊源而论，金毓黻似与所谓旧派关系更深。但是金毓黻本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面对新潮汹涌，却并不守旧，甚至表现出了相当明显的趋新意向。只是金毓黻对待世变与学问，都取相辅相成，殊途同归，求是而不强同，不偏于一端的持平态度。他教人学文，始终主张学桐城，不仅与鼓吹白话的新文化派截然不同，与尊师黄侃也有异。他看《唯是学报》所载林损的《述古篇》论泥古诬古之非，“一指笃旧，一指骛新，二者各有所失，林氏颇欲持二者之中而为此论。寻其所言，述古者，乃取古事以为今镜，犹孔子因夏、殷礼而损益之意，取舍之权，仍以宜于今不宜于今为衡，是其立说，与现世潮流思想并无乖违。述古之职，由斯而明，不图林氏竺守古学，反以持论自陷，且真理因之愈彰，此林氏之所不及料也。”反对泥古不知变通。并进而论道：“以现在言，只有新而无旧，然有新未尝不包旧；以过去言，只有旧而无新，然无旧亦不能生新。此新旧二者之辨也，余于静中参验得之。”对于北京大学教授刘复所撰新书《中国文法通论》，金毓黻以为“用归纳法剖析中国文法，颇得纲要。自马建忠氏撰《文通》后，能不依傍前人稗贩外籍者，惟有此书，诚仅见之作也。一年以来，吾国政象，混莽极矣。独有二三学者，冥求搜讨，昕夕不遑，屡有造述，成绩斐然，此真学术界前途之佳象也。而二三老成，稽首蹙额，相与叹息，谓为国学陵夷，今不古若，何其慎乎！读刘君此作，能无豁然。”

不久金毓黻专门从图书馆借来新出版的著作，分为科学方法论、文学概论、国语文法、文字学、史学等五类阅读，据称“近日学术界革新之事业方法有二：一曰整理国故，一曰迎接新潮。新潮之输

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

《吴宓日记》第4册，第282页。

《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48页。

《静晤室日记》，第5599页。

《静晤室日记》，第72页。

入者,已具有条理,自无整理可言。至言整理国故,则多主用科学方法。胡氏《中国哲学史》之著,其见端也。然科学方法之何若,为研究学术之阶梯,引为先务,职是故耳。”这可以视为其以整理国故为迎受新潮之举。金毓黻有感于《建设》杂志所刊胡汉民论儒教喜排斥异己的文章,担心此亦为当时新文化运动者的命运。

1921年2月28日,金毓黻拟作《学术论》或《并行与调和》,其大旨“首论方今学术,异说蜂起,道可并行不悖,不足为病。次论并行与调和异。并行者,各自独立而不相犯;调和者,去其异而摭其同。混淆黑白,强作解人,二者截然不同……次论唯其并行,故各树壁垒,互相非难,其于世运,亦互为倚伏消息,此起彼仆。迨为日既久,人皆厌之,二派忽互相结合,别生新机,茁壮萌芽,起而代之。此所谓新者,与调和异。调和之义既如上述,此则面目、性质、皆与旧者迥殊……往世若朱、陆之争,汉、宋之争,近日新旧文学之争,东西方文化之争,皆此类也……次谓学术之是非,随时会而异,适于时者,即为真理。吾人但观察时势所宜,以定从违,不必横存主奴之见以自陷。未论道虽并存而不悖,但吾人取舍从违,不可不有定见;否则倘恍游移,不下己见,出以模棱两可,虽能成名,上之不过如梁任公,下之亦仅为张东荪,劳瘁毕生,徒为稗贩,终无所得,真可笑也。”此文是否写成发表,不得而知,我们从中却能清晰把握作者对于新旧派分的态度。

1923年,胡朴安在《国语旬刊》发表《整理国学刍议》,批评“今之治国学者以一知半解为创获,抽数寸之丝自诩有用,不知全丝之弃者实多也。(今之治国学者不在全部着手,往往考一人之年岁至费数万字,与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有何异乎?)”其时金毓黻正以中国学人往往好博不精为鉴,对胡氏的看法有些不以为然,他说:“胡氏治学颇主先求其会通,次以寻其枝叶,所谓先立其大则小者不能夺,立论何尝不是?然十丈之木积于一寸,万顷之涛积于一勺,不自铢积寸累作起,而言能观其会通,大言欺人,徒自误耳。梁卓如谓清代诸儒多为狭而深之学问,所以能精,此真一语破的,惟其弊坐在终身徘徊于此,不知更进一步,故不免以破碎贻讥。胡氏鉴其弊而不究其利,执其果而不求其因,立论所以未融。”

稍后金毓黻又进一步论道:“往世学人多务博知,语云:‘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不知古籍充栋有若江海,一人之腹岂能尽受?况自海通以后,西籍东来,学术复日新月异,分门专攻且不能精,并鹜兼营大圣犹病,故用心如何之博,而力终有不逮也。尝谓学问之道,只宜求精,不宜贪多,究一名物,研一理道,务必穷原竟委,以求真知。其无与于此事者,虽一无所知,无害也。孔子曰:‘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此即千古为学之准。积知日久,自能贯穿百家,博虽未可骤语,通则庶几近之。故学者只宜求精、求通,不可求博,博则贪多而不能精,学不能精则终无通之一日,不可不戒。”“傅君斯年谓研治学术问题,重于泛论。此所谓问题者,即梁新会所谓狭而深之功夫,亦与李笠氏所谓读古书宜先窥本书,后读通论,同一旨趣也。余年长晚学,喜读泛论之作,如未遍阅群经,而先阅皮氏之《经学通论》,未读全史,而先览刘子玄《史通》。以故所得至浅至陋,侈口而谈经例史例,而实一事不知。循此不改,恐一业无成。傅君之言,诚我之苦口良药也。”

今人看清季以来思想文化学术,受后来主流一脉叙述的影响,好以中西新旧之类的两分法立

《静晤室日记》,第106页。

《静晤室日记》,第159页。

《静晤室日记》,第263页。

《静晤室日记》,第954—955页。

《静晤室日记》,第985—986页。

《静晤室日记》,第1148页。

论。就极端而言,两分固然界限分明,但一般而论,中西新旧等等因素虽然存在,却未必形成楚河汉界,壁垒森严。用主流一脉的叙述架构,这些多数无法安置得当。1924年1月,金毓黻读皮锡瑞《经学历史》,感悟道:“清季诸儒谈古文学者,以孙籀<sup>廌</sup>为最平实,而章太炎则不免失之激切;谈今文学者,以皮鹿门为最平实,而康南海则失之夸,廖季平则失之诞矣。二派相争,始于嘉道,迄清亡而始稍戢。惟孙、皮两公不尚意气,或专讲故训,或宣究大义,只知实事求是,不知有门户之争,是最可师法者矣!”

秉承上述宗旨,金毓黻对于那些批评趋新乱象的意见也相当重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渐趋平和的迹象。1924年章太炎的《教学弊论》发表,此时章太炎已被视为拖车向后,渐入颓唐,该文所指摘的为学五弊,如尚文辞而忽事实,因疏陋而疑伪造,详远古而略近代,审边塞而遗内治,重文学而轻政事等,主要即指新式学校文科的流弊,矛头所向,新派首当其冲。而金毓黻认为是“针砭时贤之作,持论明通,致为可贵”。他说:“寻章氏所论,以重耳学弃眼学为学校师徒授受之弊制,可谓谈言微中,揭举高明光大四字,为治学之准绳,尤足杜歧途明正轨。世谓章氏好为迂怪不近人情之论,特未细心察之耳。章氏又谓今之学校先宜改制,择其学风尤劣者悉予罢造,闭门五年然后启,冀旧染<sup>廌</sup>俗悉已湔除,于是后来者始可教也。又曰:‘不能行吾之说,则不如效汉世之直授《论语》、《孝经》与近代之直授《三字经》、《史鉴节要》便读者,犹愈于今之教也。’此其持论,诚不免偏激失中,然又盛讥翁同龢<sup>龢</sup>喜谈《公羊》而忘其他经史,潘祖荫好铜器款识而排《说文》,始驱学者于诡侧之径,此诚切中近五十年学术界之积弊矣。故章氏所举五弊,今日之治国学者多患之,以为不如是则必见讥于大雅也。从章氏之说,则虽读《三字经》、《史鉴节要》,尚可日进于高明光大之域。否则日谈《公羊》、好铜器,立脚虽高,其隐患之中于人心者,将不可思议。挽近士习庞杂,或尊古而昧今,或援西以鄙中,持论愈高,见理愈谬,譬如治丝而棼,自以为是,不知知识者已晒议于后矣。得章氏之说以正之,其裨益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

金毓黻读吕思勉《中国史》,认为“有系统,有断制,堪称为中国史之第一名作,并世作史诸家未能或之先也。”由吕著新解迭出而无穿凿武断之失,金毓黻引申道:“今日之新史学家,动云民族、社会为史籍之中心,古人不知注意及此,故中国无史。不知前世一国之重心在君主,故偏治乱兴衰,以为人君之鉴戒;今世一国之重心在民,故偏重民族、社会,以究进化之因果……不明因时之义,不知会通之故,以古人之见胶固胸中不知变通,固背因时之义,以今之见裁量古人而横坐以不是,亦岂通人之论乎?”他请高闾仙为东北学社同人讲学,高氏指“北平各学校之现状,说务新奇,言人所不敢言,杂之以客气,存之以成见,不谓之流弊不得也。”主张先理旧学,再究新学,反对附会西学,“讲学问应先明途径,标立宗派,自存成见,非善学者也。学者各就性之所近以研究,不必以己所好而以为是,不好而以为非。因他人已讲好,无以复加,于是别辟途径,以为号召,此今文学之所以立也。考据家之长处能在寻出来源,而其短处则在徒逞一时之快,而不顾上下文义。”针对当时北平有一派讲学问专寻王高邮之短,高氏以为“考据专明一义,不顾全体,往往失古人之意,故为学当以诚为主,能诚始不流于偏。”金毓黻颇有同感,认为:“综观先生之所论,力求平实,不尚新奇,整理旧学,以为新学之先驱,并非反对新学。即此一端,亦足以为吾人之师矣。”

金毓黻甚至认为顾颉刚、钱玄同“两先生乃今之妄人,其言不尽可信……凡明一义,说一理,能

《静晤室日记》,第1013页。

《静晤室日记》,第1195页。

《静晤室日记》,第1470—1471页。

《静晤室日记》,第2503—2505页。



破尤贵能立,此论理学之通则也。顾、钱两先生能破而不能立,故所破者多不可靠。”抗战期间他从友人处借来《学衡》杂志多册,“读其中诸文如逢故友。念自旧典丧失,尝惘惘如忆良朋,《学衡》亦其一矣。”这显然反映了金毓黻学问取向的情感偏好。

### 三、由分而合归本原

因缘上述人脉以及自己的学术理念,金毓黻主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期间,的确贯彻了和而不同、求是为归的宗旨。这主要体现于三方面,其一,金毓黻本人的思想观念有所变化;其二,邀请主张各异的不同派别的学人来校讲学;其三,确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的治史纲领。

随着个人学识阅历的增长,以及抗战以来学术风气变化的影响,金毓黻的学术理念出现了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其中比较显著的一点,是由原来受新派影响的由专而通,转向传统的由博返约。

五四时期,受个人经验及学界风气的影响,金毓黻主张求精,反对务博,他说:“凡人于学问,只宜求精,不可务博,博则力分,力分则业荒,业荒则永无求精之日。博与精常成反比,而吾国学者多务博,此所以少进步也。以余所知,友朋中知关心学问者,皆偏于求博,余之受病尤深,此后宜力戒之。”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自责“务广而荒”,金毓黻认为其“自知甚明”,进而论道:“吾国往世学者有一通病,曰不求精而务博。即曰能精,亦精者什一,而博者什九。又此方求精,他方复求博,欲一人之身万物皆备,此吾国学术所以不能进步也。梁氏之好博,亦吾国学术界数千年之遗传性使然,梁氏实蒙其影响而非其咎也。新学巨子胡适之亦有好博而不求精之弊,试一翻其著述自知之矣。梁氏如能从此彻底觉悟,大加忏悔,而别作狭而深之运动,为学术界作一革新模范人物,诚吾国学术界前途之幸也。”他看吕思勉在沈阳《高师月刊》发表的《论整理旧籍之方法》,觉得“立论平平,无卓识独见可言。唯谓近人思网罗群籍更编一完全之史者,其结果无不失败,反之专研究一部份更求精密者,其结果无不成功,并举《通志》之不如《通鉴》为例,此真不刊之名论也。夫专则易精,泛则难备,专门史之优于普通史以此也。”

然而,抗战期间金毓黻的看法可谓急转直下。1938—1939年间,金毓黻写成《中国史学史》,关于专题研究与新史撰述的关系,有如下论断:“部分之研究,其手段也,整个之贯通,其目的也,不能因在手段过程中,得有大量之收获,而遂忘其最后之目的,即不应以部分之研究,而忘却整个之贯通……盖为人而作传谱,为事而立标题,皆为治史之手段,而其目的乃在造有系统有组织之通史专史,亦必各个部分咸有精确之断案,然后造作通史专史乃易于成功,亦即吾理想中比较完善之新史。”他认为,治史之士,宜备三勤,即眼勤、手勤、脚勤。“学贵博综,治史尤要,隘涂自限,决难有成。子玄有言:记言书事,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故必博览群书籍,知其大略,然后可言删定勒成,古人著书,取材至富,温公《通鉴》即其明征。设非乙部名著,悉入吾眼,则执笔撰述之时,何由奔赴腕下,供我驱使。”友人谓其读书预算太大,“故每撰一书则觉头绪焚烦,积年莫殚之

《静晤室日记》,第2585页。

《静晤室日记》,第4122页。

《静晤室日记》,第157—158页。

《静晤室日记》,第220—221页。

《静晤室日记》,第362页。

《最近史学之趋势》,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2—440页。

《静晤室日记》,第4145页。

势”。而金毓黻觉得：“然取材不丰，考论不详，何足以言撰述，且安能示人传后。是故宁求其质之精，而不求其量之多，质精而量多，非有兼人之力不可。”其致函高晋升，也谈道：“愚谓学问之道，一在征文考献，一在问难质疑。不多读书，无以极其博，不多求友，无以致其微。昔者韩昌黎氏论毁字之原，由于怠与忌。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今之学者能不蹈此者，盖亦鲜矣。”复函黎思年，又提及：“研乙部书，始于博而终于约，当其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读破万卷，犹患其少，迨用力既深，不无偏好，就其偏好之一段，加以极深研几之功，由博而返乎约，于是有深造自得之效矣。”

1941年8月，金毓黻专门总结研史之法，于具体五法之上，提出：“综而言之，一须求正确；二须求贯通。研史之结局，能达到十分正确者甚少，但不能不以求得正确为目的，此其一。史料如散钱，以贯穿钱，钱始不乱，故研史必以贯通为目的，此其二。研史之序，始于博而终于精。博而不能精，则不免博而寡要之讥。然未有不博而能精者，博而能精，则专门名家矣。”其时萧一山撰文《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认为史学有详近略古之例，“且史学本为一综合科学，必纵览广乙得约之旨，而后能无偏执固陋之弊，是史学又以贯通为务，殊非仄深之士所能喻也。”金毓黻颇有同感：“研史以达变知今为务，以详近略远为例，实为史学之真谛。至贯通重于仄深，而仄深不过为贯通之始功，此又为研史者应知之义。萧君揭橥此义以告学者，诚所谓探骊得珠，片言居要者也。”

理念转变之下，金毓黻的一些学术判断也相应有所变化，对于原来在北大时的老师陈汉章的学问评判，即为显例。他说：“曩岁陈先生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通史，繁称博引，累数百翻而不能终其物。叙上古史喜用《路史》、《绎史》，多为荒邈无稽之说，而先生不加简裁，遂为执业诸子所不满。然蕲春黄先生尝谓陈先生读书之多，称引之富，一时无两，难能可贵，自刘仲叔以外为推重之一人，诚为服善之笃，亦见持论之公矣。今细译先生此作，则于探赜索引之中，时著平实可信之语，博综约取，允为传作，以视曩日判若天渊，岂非以年愈高而学愈进，学愈进而心愈下欤。”实则金毓黻本人的观念变化也是看法前后不同的要因。陈汉章的学生辈大都只知道陈读书广博，而其京师大学堂时期的业师柯劭忞却屡次说：“当代经学，伯陶第一。”其原因决非仅仅由于陈汉章读书广博且记忆力强，更重要的在于贯通的前提必须由博返约，没有博闻强记，很难达到贯通无碍的境界。

当然，从通的角度看，金毓黻并非完全复归旧轨。他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指摘梁启超之病为妩媚，胡适之过为武谲，表示“诚为的当”，“胡氏所倡新文化运动，亦有可议之处，然吾闻之能破而后能立。夫既已破之矣，又贵继之以能立。胡氏于旧文化已极破坏之能事，而同时亦能提出建立之新条件。此胡氏所以能有局部之成功也。钱氏虽力攻胡氏，加以讥笑，不过属于破坏之一方，而未闻有建立之方案。是以钱氏于学术上究无所贡献，此又钱氏之不及胡氏者也。若夫梁氏，因有趋时好以媚少年之嫌，然于旧文化虽未如胡氏之尽量摧毁，而于学术上亦尝提出新建设方案，以嘉惠来学。两两相衡，钱氏似不敢望其项背。由是言之，钱氏此论，不过快其口说而已，初非深根宁极之论也。”对于钱基博褒贬周树人欧化的国语和章士钊欧化的古文，金毓黻则不以为然：“谓钱氏濡染于古文雅辞甚深，故士钊之欧化的古文称为谨严，又誉为茹古涵今，铨裁自我。而于树人之欧化的

《静晤室日记》，第4183页。

《静晤室日记》，第4243页。

《静晤室日记》，第4317页。

《静晤室日记》，第4779页。

《静晤室日记》，第4834页。

《静晤室日记》，第4046页。

牟润孙：《蓼园问学记》，《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0页。

国语,则深致不满,然今之少年崇拜树人之国语文,几以为斯道之圣手。《鲁迅集》风行全国,少年无不人手一编,盖其崇仰之情尤过于钱氏之崇仰士钊。且以人数较之,崇仰士钊者多在中年以上,或为老年,至崇仰树人者,则十、九为少年也。两两相较,则崇仰树人者多于士钊十倍,其势盖不可侮矣。然犹可曰少年人识力未定,不足以为定评,然新旧殊途,鉴赏自异,不能谓中年人、老年人之果为是,而少年人之果为非也。总之,士钊、树人二氏皆有建立之绩,为人称颂,胜于壹意摧毁而不知建立者,且殊未易论其孰为优劣也。”

与此相似,金毓黻拟重订《续通鉴》,合宋元明清为一书,偶与罗家伦论及,后者谓“《通鉴》有启发性,而《毕鉴》无之。喻以近人之著作,则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启发性,而冯友兰之作无之;梁任公《近三百年学术史》有启发性,而钱宾四之作无之。然冯、钱之作,皆视胡、梁为密,其终不及者,惟在无启发性耳”。这样的看法当属见仁见智,而金毓黻以为“所论极有理致”。

金毓黻的求是求通,乃新的变化趋向,其显著表现在他对几种新出中国通史的看法。北大同学兼同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立论和金毓黻多异其趣,金毓黻认为该书“力反昔贤之成说,而为摧毁无余之论,毫无顾忌,又前此尚论诸家所未有也”。范文澜“往日持论尚能平实,今乃为此偏激之论,盖为党纲所范围而分毫不能自主者”。范著主唯物史观,金毓黻的意见并不在此,对于同样以唯物史观为统的周谷城的《中国通史》,金毓黻的看法却是:“然其最可取者,全书以经济史观为主眼,一贯而下,颇能自成家言。论其骨干,实为绝去依傍,自抒所见,此亦难能可贵之一端。余读此书有不忍释手之征象,则此价值高人一等又可知矣。”

不仅如此,金毓黻还将周著与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比较:“愚谓治本国史有二途,一曰鸟瞰式治史法,一曰虫蛀式治史法。置身于史实之外,凌空而俯视全局,历历在目,位置之远近,形状之大小,悉可一览而得,此所谓鸟瞰式治史法也。置身于史实之中,一一从事展玩,而从而分析其内容,以寻其症结所在,此所谓虫蛀式治史法也。鸟瞰式治史法,如乘飞机升于高空,以俯视某大都市之全景。虫蛀式治史法,如身入某大宅中,而细数其所藏。虫蛀式治史法,亦可曰解剖式治史法,取若干史实一一为之分析,而明其得失去取,非置身于史实者不能为也。近人吕思勉氏之《中国通史》,系用虫蛀式治史法,著重于分析,如身入大宅之中细数其所藏。周氏之《通史》不然,不重分析而重观察,凌空俯视,以明其全局情状,此则用鸟瞰式治史法也。愚谓治通史应以鸟瞰式为主,而以虫蛀式或解剖式辅之,庶乎其可,否则通于此则窒于彼,虽名通史,实史考之丛编耳。”就通史而言,金对周著的评价还在吕著之上。

本着学术互竞,不囿于门户的精神,金毓黻以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和历史学会的名义,邀请学术观念与做法各异的学人前来讲学。稍后到东北大学兼职,也继续请人讲学。仅就日记所载,先后有罗家伦、李济、郭沫若、卫聚贤、丁山父、潘石禅、王献唐、萧一山等。所讲虽有泛论与具体的分别,但均涉及治史的态度方法等大问题。

历史学会第一次讲演,邀请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时间在1939年9月29日,讲题为《治历史之态度与方法》。他首先强调历史为事实的记载,过去的事实不能改变,但史实受时空观念影响,难以确认,史家因而可以不断重新认识。重现史的观念,应以进化论为基础。以既得之事实,不断

《静晤室日记》,第5243—5244页。

《静晤室日记》,第4927页。

《静晤室日记》,第5869页。

《静晤室日记》,第5039页。

《静晤室日记》,第5014页。

增加了解,即为历史的认识。研究历史不可矿石化,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往往强人就我,请君入瓮,先有成见,不能产生历史学者。研究历史的先决条件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或基本,有了社会科学的各种工具或技术,才能产生有意味的史学。专题研究可以约而能精,但不能忘却整个事实。以小见大,为专题研究之利,还要将历史多量之事实加以联络,立一整体计划,再从事分段研究,研究有得,再为联络,以得公平估价。此即治史方法。金毓黻认为其治史理论“颇能治中、西为一炉,精湛之至”。

1940年5月5日,金毓黻邀请郭沫若和卫聚贤来校讲演。郭氏所讲为考古学与文字学应相互为用,考古学者往往成见太深,对文字学加以轻视,其实文字学者只是缺乏科学方法。考古学者过于拘泥形式、花纹。以纪载之文字居于次要地位,亦属偏见。若能将二者打成一片,使其相得益彰,则其效尤宏。卫聚贤则概述考古学的五条途径,即书本材料、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即人种学)、地下文物。郭沫若所讲实为近代中国考古与史学研究的一大问题,至今仍不免困扰相关学人。

1941年4月,金毓黻为了唤起考古对于后学的精神感召,邀请李济来校讲演,以历史学会名义主持,史学系全体学生出席,他系学生亦多来旁听。其讲题为“治史学之方法及趋向”,有意思的是,李济也认为研究古史以疑古为出发点,不信文字记载为太过,依据地下发掘所获新史料,以证古史,或补其未备,固为新的研史方法,但不能因此而抹杀文字记载。研史态度应以矜慎为主,不必畸于一偏。这与郭沫若所讲,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年5月,该校历史学会布置文物展览会,又请王献唐演讲鉴别古物的方法。

1941年8月,在东北大学请丁山父为研究生讲治古代史的方法,其一曰怀疑,即鉴别史料真伪,以周还周,以汉还汉,不以乙时代材料证甲时代史事。其二为建设,即以民族问题为研究中心,由语言入手,而得其真相。考证、语言、地理诸学,为研史初步,研究制度乃为历史本身。“吾国史政治之影响究大于经济,近人研史或从经济入手,非研史之正轨也。”金毓黻觉得其所谈颇多创见,“余因此而得有启发”。

稍后请潘石禅讲演,所讲为《清代之考证学》。潘认为清代汉学家求难求是,今人则求易求新。清代考证学有三要点:一为留心细微;二为精于分析;三为必有证据。留心细微以树立根柢为前提,所谓树立根柢,乃为整个而非部分,亦为必不可缺之条件,前人所谓稳扎稳打是也。于某一点稍有忽略,即为学问全体之缺点,有一字不能解,或为之误解,则其全部为之改观。精于分析,以收集完备为前提,钩沉极致,必有条理。必有证据,以不妄言为前提。证据既具,始谓之为不妄言。其末流又有三弊,一曰重颂数,忽躬行;二曰舍根本,逐微末;三曰立门户,逞私见。今人多置基本书不读,而别求其欲读之书,所以愈渊博而愈空疏。潘石禅与金毓黻同为黄侃弟子,而金毓黻对其极为推重,许为“其真能承先生衣钵而得其心传者,石禅一人而已……是则读书种子之称,惟石禅当之而无愧”。对于演讲,金毓黻叹为“所论皆极精辟,足为学子针砭,亦可谓大声疾呼,垂涕而道者矣。”

稍后萧一山演讲《治学方法及其态度》,略谓治学步骤有三:一曰博,二曰约,三曰通。学者先由

《静晤室日记》,第4376页。

《静晤室日记》,第4551页。

《静晤室日记》,第4697页。

《静晤室日记》,第4714页。

《静晤室日记》,第4786页。

《静晤室日记》,第4662页。

《静晤室日记》,第4804—4805页。

博反约,由约求通,求通之中又有博。科学方法有二,即演绎法与归纳法,演绎法近于博,亦为由约而博,归纳法近于约,亦为由博反约。又有辩证法,分正反合三段,目的亦为求通,一言合则通矣。历史学之科学化有因果、实证、系统三段,因果近博,实证近约,系统则通,而后可也。“总之,吾国固有之学术精神固极伟大,而论学之语言,人之殊患于散漫无系统之可言,是为方法不良。应以中国治学之精神,参以西人治学之方,二者相济,庶几可矣,此即所谓治学方法也。”至于治学态度,亦有三端,即求真、虚心、专一。

这些演讲对金毓黻本人也有所影响。以求通而论,可与该系教授沈刚伯为研究生所讲“近代世界史界研究之趋势”相互印证。沈氏认为,工业革命、民族主义对史学研究影响颇巨,工业革命有二特点:一为分工,二为规律化。“流风所被,史学研究遂亦进入狭而深之一途,竭精敝神于小问题,而昧其全体,诚学问之蔽也。惟近十余年来,世运推移,学者多感其弊,而综合研究乃代之以起,此可以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伦敦世界科学家大会之提案证明之……近数十年吾国研史之风,一受外学输入之影响,一受固有朴学之影响,亦与世界研史之趋势同其轨,并世学人亦多竭精敝神于小问题,而罕为具体之研究者,直至最近始渐有转变,如能改变其风气,而为博大综合之研究,则得之矣。”金毓黻称:“沈君所论之最有趣者,近顷学人号称精研史学,乃在学校任教,至不能开二三种科目,其讲一科目多至数小时即已竭泽而渔,此诚可笑,此缘竭精敝神于小问题之所致也。”

考古学的影响亦相当明显。金毓黻为此专考文物之义:“往日治史,必以征文考献为重。所谓文献,即史料也。今世学者治史,首重搜集史料,而加以整理之。所谓史料,实含文与物二者。此所谓文,乃兼文、献二者并言。至所谓物,则在文献之外,即地下发获之实物是也。古人重文,故一求于典籍,实物可供参考者,亦以有文字者为贵。今人不然,古代文物,无论有无文字,皆极重视。而物之价值尤过于文,凡史籍所记,苟无物之证明,则以为不可尽信……此为近日谈史风气之所趋,故余特举文与物二者以明其究竟焉。”

金毓黻求是求通的观念,集中体现于他为中央大学历史学系撰写的《治史纲要》。该纲要形成于1941年6月,仿《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之义,亦为三纲八目。金毓黻的想法,是鉴于“本系向未建立中心,致学子茫然无所适从”,希望以此有所改变。三纲为:

“第一、以研究制度文物为中心。说明:本系治史,侧重中国部分,故以研究制度文物为中心,应以各正史之书志及《通典》、《通考》、《会要》、《会典》诸书为研究对象。其前代治乱大事,如正史之纪传,及《通鉴》诸书所载,仍就制度文物有关联者从而研究之,其他则暂行从略。

第二、求通重于求专。说明:本系研究之要点,求通重于求专,以探求历代制度文物之因革损益为主,视断代、专门、国别各史皆为通史之一体。又如清代考证学之优点,亦尽量利用之,但亦用以求通,而非求专。凡作专题之研究,皆以力避支离破碎,求得贯通之旨为主眼。

第三、以养成学问欲为系风。说明:本系以养成学问欲为系风,即为学问而治学问之谓。如太史公之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乃为治史之极则,故于史学之本体及辅助治史之学科,皆以积极之态度从事之,持此不变,积以三四年之岁月,自有相当之成就,而良好之系风亦藉以养成矣。”

八目主要有:本系课外研究分组进行;本系同学应就表列各组及其细目,每人任择两种为研究对象;各组研究指导,由本系师长担任,有必要可商请系外专家;同学每两月撰送研究报告一次于指

《静晤室日记》,第4836—4837页。

《静晤室日记》,第4924—4925页。

《静晤室日记》,第5831页。

导师长;研究报告成绩评为最佳者,给予奖金并设法发表;参考书由本系向图书馆借用,必要时酌量自备;暑假尤其适用,但研究报告仅限一次。分组为五,即通史(含中国、西洋等科)、断代史(含古代、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蒙、明清、近世等科)、文化史(即制度文物史,含中国文化、西洋文化、学术、历代制度)、专门史(中西交通史,以及中国佛教、史学、社会、经济、地理沿革、历史地理各史)、国别史(西域、印度)。

以研究制度文物为中心,其实就是关注正史即政治史,这可以说与清季至抗战前所有新史学的主张颇异其趣,而回归中国传统史学的正轨。只是并非简单地复旧,而是在求是的原则下,吸收各家各派之所长,融会贯通。不受门户局限的目的,是要提纲挈领地把握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特质,以制度文物为脉络,贯通包括治乱兴衰在内的整个历史的发展变化。为此,他特请贺昌群开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史课程,并专函说明,“系史系特开之课,与政治系之中国政治史旨趣不同,彼所重者政治,因而叙及政治之制度,其范围有限。至史系所开者,以政治经济并言,举凡《通典》、《通考》所列礼乐、官学、兵刑、钱谷诸门,无一不在网罗之中,则所赅者广矣。鄙意中大史系之特点,应以研究典章制度为中心,则吾兄所开之课,亦即中心之中心也。不惟兄应如是,即弟拟开之课亦侧重是点,专言宋代以来之制度,以与兄所讲者沆瀣一气,如是则兄乌所用其迟疑乎。”

不过,《治史纲领》固然是金毓黻等史家高明的体现,而高明也就意味着高难。金毓黻读《宋会要》食货门农田杂录,“此书盖为档案之汇录,亦分类之史料汇编,故不胜其烦琐难读之感,乍读之实觉干燥无味”,如果细心阅读,可见有宋鼎盛时的社会状况以及朝局争斗。“此等史料皆于干燥无味中求之,一不留心,稍纵即逝,故读此等书籍,非有耐心不可,从首至尾一字不肯放过,乃能小有所获。此治制度文物之史,所以尤难于治乱兴衰之通史也。”对于青年学子,似乎悬的过高,并非短短数年间可以成效大著,以致于中央大学培养出来的治史人才,相比于其他各校,略显不足。或以为史学为一高成本的学问,必需阅历与积累,青年时期的判断追求,后来随着年龄与知识的增长,才能逐渐变化。这对于史学的教学,无疑存在两难。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号称老成,也不免有人同时向北京大学研究所暗通款曲,以致院方不得不明令研究生必须做出取舍。

“学衡”派主将之一的胡先骕十余年后总结道:“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王伯沆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这样说多少有夸大《学衡》作用之嫌,也与胡先骕本人先前的动摇不相吻合。可能的情形是,派分则难免偏于一端,加以意气用事,遂脱离学问应循的轨则,并与多数学人的一般态度不相啻。时过境

《静晤室日记》,第4738—4741页。

《静晤室日记》,第4870页。

《静晤室日记》,第4751页。

尚小明提交“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6月29日—7月2日)的论文,对民国时期各大学史学系培养的学人有详细统计,其标准口径略有可议。其实东南大学时期也培养出浦江清等良才。抗战期间,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出不少人,金毓黻教过的学生当中,如邵则云、苏诚鉴、王聿均、黄彰健、唐德刚等各有成。

胡先骕:《朴学之精神》,《国风》第8卷第1期,1936年10月1日。

迁,风气转移,趋于极端的派系不得不回归正轨。只是造成派分的原因不可能根除,人的有意识活动与历史有规律的运动之间,本来矛盾统一,而人的能力、条件有限,往往各取一偏,治学派分因而难免,于是进入新一轮新的循环。后来中研院成立近代史所,引起不小的争议,看似学术观念分歧使然,但如果掌门人不是郭廷以而是金毓黻,学术分别仍旧,反应效果则当大相径庭。

[作者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510275]

(责任编辑:谢维)

书 讯 ·

###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雷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1 月出版,31 万字,29.8 元

晚清是中国发生历史性大转折的时期,而李鸿章则是晚清的著名官僚和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书所揭示的即是他在晚清 40 年(1862—1901)中,特别是在重大政治事件与中外关系事件中的思考、言论与活动。作为官僚,李鸿章既敢于任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擅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由此而成为在云谲波诡的官场中朝廷不得不深倚的重臣。另一方面,作为洋务派,“懂外交”是李鸿章能够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事业、名声,却也被毁于此。

本书不仅描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而且展示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政治场”。读者从书中可以感受到,清廷在形势从容时拒不改革,到危机来临时却已来不及改革,40 年中,清廷就是这样被形势步步紧逼,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变革图存的机会。另外,从地方派的崛起,到外交上的荒唐,再到王朝最高阶层的腐败与私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种种阴暗,及帝国崩溃前的征象,也都被作者一一揭示出来。

本书以李鸿章所上奏折作为“经文”,以事件发生的环境和来龙去脉,以及李氏的用意作为“传疏”,用这样的写法来编撰历史著作,可谓别具一格。

### 《国民党特务活动史》

马振犊著,九州出版社 2008 年 3 月出版,65.7 万字,68 元

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活动,是中华民国史上隐晦最深的一项内容。过去学界有关该课题的研究,因史料短缺和客观条件所限,成果鲜见。

本书作者历时十年,在广泛而用心地搜集了国内外相关材料的基础上,详细探讨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源起、分支、活动和他们在 1927—1937 年间与中共地下党的激烈斗争,论述了“中统”与“军统”在抗战时期的分立、发展以及内部管理与对外关系,对国民党特工在抗战中既抗日又反共的历史做出了如实的记录。此外,本书还分析了“中统”与“军统”在抗战胜利后由历史高峰迅速衰落到改组垮台的过程及其原因,并对县以下基层特务组织的活动进行了个案剖析。

本书有关战时中国与苏美英等国情报特工机构的合作历史的撰述,1930 年代国共在隐蔽战线的斗争内幕等章节,以及许多披露历史谜底的细节,都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可以说本书是目前有关国民党特务活动史的一部比较全面而客观的作品,也是在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内填补空白的代表作。

#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No. 5, 2008

## The Political Struggle between the CCP and Guomindang after the South Anhui Incident

..... *Deng Ye* (4)

After the South Anhui Incident, opinion in the Guomindang was divided into four camps: He Yingqin proposed organizing another New Fourth Army for Ye Ting; Bai Chongxi advocated eliminating the New Fourth Army's designation altogether; Xu Yongchang stood for making a complete political break with the CCP; Wang Shijie, Zhang Zhizhong, He Yaozu and some others strongly urged moderation. Chiang Kai-shek finally adopted Bai Chongxi's stance. Though keenly opposed each other, both the CCP and Guomindang restrained themselves in order to avoid a complete split. The focus of these restraints was preventing the Eighth Route Army from becoming embroiled with the New Fourth Army. After the situation was brought under control, the last problem was to reach a political settlement of the South Anhui Incident. The struggl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over the conditions for a settlement were concentrated on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Second National Participating Conference. The third parties took advantage of their position mediating between the CCP and Guomindang to propose its own independent conditions. Chiang Kai-shek used concrete benefits as a lever to satisfy the third parties' conditions and lure them to his side. As a result, the CCP refused to attend the National Participating Conference and exposed the politicized nature of the South Anhui Incident. However, Chiang Kai-shek convinced the third parties to join in a unanimous rejection of the CCP's conditions at the National Participating Conference. Thus, both the CCP and Guomindang had gains and losses, and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shifted to a "waiting game."

## Jin Yufu and the Division and Merging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Styles of Study ..... *Sang Bing* (22)

In later mainstream narrativ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styles of study in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are vaguely synonymous with new versus old. As this position has been passed on from one scholar to another, it has hardened into a prejudice and a sore point and continues to steer academic trends. But in fact both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incorporated new and old, and ordinary scholars at the time did not make a sharp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In the late 1920s there was considerable exchange between the South and North Factions, particularly when the capital was moved to Nanjing. Jin Yufu, graduating from Peking University but not belonging to the New Culture Faction, took advantage of this exchange and presided over the South Faction's home base: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Central University. As styles of study were transformed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as his own experience and scholarship developed, Jin came to advocate mixing the two factions together both ideologically and in terms of personnel. He advocated abandoning extremist opposition and returning to the fundamentals of academic studies.

## Deng Tingzhen and Opium Prohibition in Guangdong ..... *Wu Yixiong* (37)

As governor-general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s, Deng Tingzhen's prohibition of the opium trade from 1836 to 1839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volution of Sino-British relations. In 1836, Deng for a time enthusiastically supported Xu Naiji's proposal to lift the ban on the opium trade, and made active preparations for it. When the Qing court decided to strictly prohibit the opium trade, Deng carried out Emperor Daoguang's policy reluctantly and failed to drive out the opium storage ships from the Lintin waters. But he did succeed in cutting off the link between the ships and Chinese opium dealers, severely disrupting the longstanding pattern of opium smuggling. However, these actions resulted in much more opium smuggling along the coasts of eastern and northern China and the revival of opium smuggling on the inner Pearl River near Guangzhou. Thus the opium problem became more critical. Under increased political pressure, Deng used the Innes smuggling case as an opportunity to force th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Can-